



东水门挑水夫

太平门挑水夫

水巷子 和 重庆挑水夫

□黄华木

“忍看巴人惯挑担，涉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添血汗熬。”抗战时期，著名画家徐悲鸿住在重庆，耳闻目睹重庆挑水夫的辛劳，作国画《巴人汲水图》：一长串挑水夫挑着满满的大桶，正往坡上爬。画上题写了这首诗，短短四句，形象地反映了重庆人吃水困难和挑水夫的痛苦。

挑水夫来来往往 巷子终日湿漉漉的

重庆是山城，崖石层叠，凿井不易。即使打井数丈，也难见到水。古时，城内大梁子一带还是森林，下半城尚可凿井取水。东水门有一口四方古井，据说还是秦朝张仪筑江州城所凿，现已无存。后来，上半城得以开发，森林为民居闹市所代替，下半城的井或干涸，或臭秽不堪，难以饮用。上半城虽有官井巷、大井巷之类的地名，其实井很少。大井巷里有一口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井里尚有水，可水却是不能饮用的，现今那井连踪迹也没有了，大井巷也名不符实了。

古今中外，不管是村庄、乡场，还是集镇、城市，其选址都不能不考虑取水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都建在江岸湖畔，原因即在于此。重庆虽有两江环绕，但山高坡陡，水不可能自己流到城里来。当年，重庆城除朝天门外，其他七个临江城外都有专门的水码头，城里的用水全靠人工挑运，挑水业成为一大行业。至今犹存的水巷子，就是一个见证。

水巷子北起于千厮门行街（后划归朝千路），南止小什字，是一条只有200多米的狭窄巷道。原来分为上、下两段，下段叫下水巷子，较平顺；上段叫上水巷子，是一大坡石梯；后来合并成一条。20世纪90年代修建新重庆广场，将新修的路命名为棉花街，占用了下水巷子的地盘，水巷子就只剩下上面的小半段了，而且面目全非。如今唯一留下的，就是小什字的最后那一坡石梯。

挑水夫大都来自农村的农民。1945年，我父亲从合川乡下来到重庆，无以求生，就曾在千厮门、临江门挑水。重庆城挑水业最盛之时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每个沿江城外，都有好几家水桶栈房。加上江北、南岸，当年重庆以挑水为生的可能有两三万人之多。从千厮门江边挑水进城，走水巷子最近。挑水夫来来往往，那条巷道终日湿漉漉的，因而得名水巷子。

除了水巷子，城里还有一条叫水市巷的，南起至圣宫，北抵骡马店。后来修公路，将其拦腰截断，占了其中近半的地盘，就变得短小了。从和平路进去，从新民街出来，长180米、宽2米，全是青石板路。巷道虽然较为平坦，但不管从和平路

还是新民街进入，都有一面很陡峭的石梯坎。原来西侧还有道路通往金汤街，后来被阻断了。金汤街一带地处重庆古城最高处，挖不出井来，又没有溪沟之类流过，吃水用水相当困难，需要挑水夫从江里挑水来卖，挑水夫也是卖水人。挑水夫从南纪门城外挑到那里，摆在那小巷路边。谁家要，喊一声，就给你挑进进去。那小巷里卖水的挑水夫多了，于是得名为水市巷，又称为水市巷子。

一天不跑十来趟 就不够一家人开支

从江边到城里，坡多路陡，相对高度一般都在50米以上，有的甚至达100米。从千厮门江边到城里小什字，或者从临江门江边到城门洞，梯坎也有好几百步。挑水夫的水桶，规定装水180斤。一步一步爬，那水不得外溢。水桶不装满，或者倒洒了一些，别人就不会要。据文献记载，清末时每担水的水价约等于三碗小面或六个锅盔（烧饼）。后来通货膨胀厉害，父亲生前告诉我，他挑水那个年代，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后，从临江门江边挑一挑水到解放碑新生市场，得的钱只能买3个烧饼。从天不亮到天黑，一天不跑十来趟，就不够一家人的开支。不是年轻力壮者，是难以吃下这碗饭的。

夏天江水浑浊，还要把水先挑到自己家，倒进水缸里，用明矾打过，使其澄清，再舀进桶里挑进城去。水若不清亮，别人也不会要。

重庆曾是一个缺水的城市，缺就缺在供水能力上。1927年第2期《重庆商埠月刊》撰文说：“一般市民，浊水饮而疾疫从生，汲水难而火灾迭见。”为防火灾，街头巷尾，修建了不少水池，千厮门那些大街小巷里也密布着这样的水池。水池没人打整，水也长年不换，蚊虫滋生，臭气熏人，是为当年一大奇观。那时候，城里人洗衣服洗铺盖，大多也要下河去洗。沿江两岸的礁石上，到处都是洗衣妇，真有些“万户杵衣声”的味道。千厮门的洗衣业，也就因此而发展兴旺。

1933年春，重庆自来水工程建成后，挑水业才逐渐萎缩。抗战开始后，重庆成为陪都，军政机关、厂矿企业大量内迁而来，人口剧增。虽经多次改造，自来水依然供不应求，挑水业甚至还有过一定程度的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南岸、江北都还有以挑水为生的人。

（作者系文史爱好者 图片由作者提供）



旧重庆的挑水夫

播州界石刻

□宋六梅

播州界石刻，1989年被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万盛目前唯一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播州界石刻位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万东镇榜上村岗二社刺库山上的一座崖壁上。从万盛城区出发，沿着万梨公路走2公里左右，穿过孝子河大桥，便可看到新修建好的播州界公园。公园内绿草如茵，植被丰茂，一座小巧精致的仿古亭格外吸睛。沿着仿古亭旁边的环形步道徐步而下，可看到一块刻有“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字样的石碑，这就是播州界石刻所在地。循着步道往下走几步，就可以看到刻有“播州界”的摩崖石刻。在修建万梨公路和播州界公园之前，这里人迹罕至，没有道路可到达，必须沿着孝子河畔走五六公里，越过荆棘密布的树林杂草，爬上陡坡，在密林深处才可见它的真面目。

“播州界”三个字刻在孝子河岸一处崖壁上，崖壁宽5.3米、高3.35米，崖壁周边植被茂密，右后侧石块风化掉落，崖壁更显孤立。崖壁上由右向左排列着“播州界”3个大字，为楷书大字石刻，双钩阴刻，深约10厘米，每个字大小为80厘米×60厘米，距崖壁底2米。在左下方1米处，以“大明成化五年”六字落款，大明成化五年也就是公元1469年。播州界石刻历经700多年，受自然因素影响，石质有一定破损。

播州界石刻旁边，靠孝子河边的砂岩石壁上，有几幅岩画，岩画具体年代不详。岩画虽然线条简单，内容却十分丰富。岩画包括十余幅个体图像，内容多为狗、马等动物，以及庙宇、人物肖像等，图案为单刀雕刻，较为抽象。这些石刻岩画对研究万盛民俗、文化及雕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播州界石刻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据资料记载，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朝政府废郎州的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六县，设立播州，这是史书上第一次出现播州之名。播州一直延续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历时961年。

唐朝后期，地处云南的南诏王国为扩大势力范围，大举北上入侵播州。唐武宗李炎闻讯后，迅即招兵买马进行反击。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山西太原义军首领杨端奉命，率领杨氏家族和犹、令狐、赵、成、谢、韦、梁、娄八大姓所领义军，应募入播州，与南诏王部队交战3年之久，击退了南诏王国的入侵，收复了播州。

唐朝政府册封杨端为播州宣慰使，治理播州，世袭官位，开始了杨氏对播州地区长达700余年的统治，历经两宋、元朝和明朝。杨氏世代统治此地，前后历经二十九代，接受中央王朝任命。

到明朝中期，播州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地域广阔，连接湖北、四川、贵州，是重要的战略要地。“重山复岭，陡涧深林，土地旷远，延袤千里。”播州杨氏向北扩张，在所在地与其他州、渡口等摩崖上凿刻“播州界”为示。

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明朝赐杨应龙都指挥使衔，后为播州宣慰使。杨应龙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开始公开作乱。明朝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杨应龙公然起兵反明，正式走上反叛的道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兵部侍郎李化龙调兵讨伐杨应龙。不久，杨应龙率部退守至三溪，

进驻綦江的三溪（今綦江区三江）、母渡，南川的东乡坝（今万盛）。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朝廷派兵大规模征讨播州，大军进剿，明军一路势如破竹，三月攻破娄山关；四月，杨应龙退守海龙屯，明军会师于海龙屯下，轮番进攻；六月十六日，杨应龙自缢身亡，播州军彻底告败。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平播诏令天下，将播州地方拆解为二府：置遵义府，隶属四川；置平越府，隶属贵州。播州从此改土归流。

播州界石刻作为告示地盘的立界碑刻，是当时播州宣慰使扩展地盘的见证，为明代中期渝黔南北地区地域划分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保护价值。

（作者单位：重庆万盛经开区文旅局）